

津輕大里

市

朝鮮通信使

文献选编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编

第一册

首

復旦大學出版社

津輕大里

瀛洲

羅刹國

朝鮮通信使

文献选编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编

第一册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第一册)/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6
ISBN 978-7-309-11063-0

I. 朝… II. 复… III. 中朝关系-国际关系史-文献-汇编-明清时代 IV. D829.3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52267 号

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第一册)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编

责任编辑/宋文涛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5.5 字数 293 千

2015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1063-0/D·710

定价:94.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复旦大学“985工程”三期整体推进人文 / 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成果，
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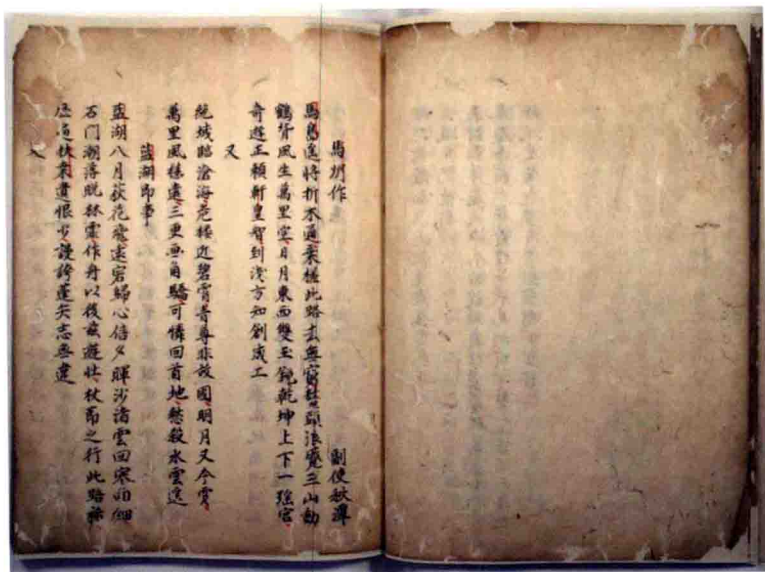
执行编辑：朱莉丽 王鑫磊 张 佳 段志强

参与整理者：朱莉丽 王鑫磊 张 佳 段志强 黄修志

钱 云 徐 凡 楼正豪 朱海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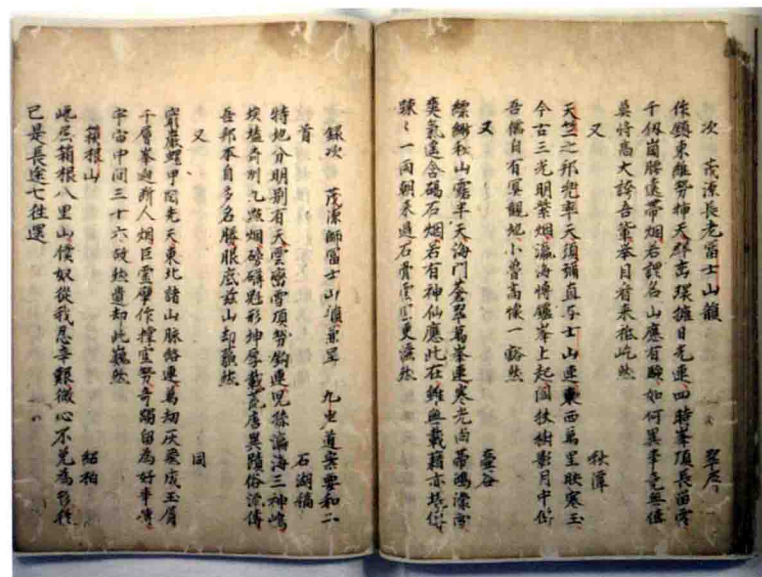
明历度（1655年）通信使笔谈唱和资料《朝鲜信使东槎纪行》（日本雨森芳洲文库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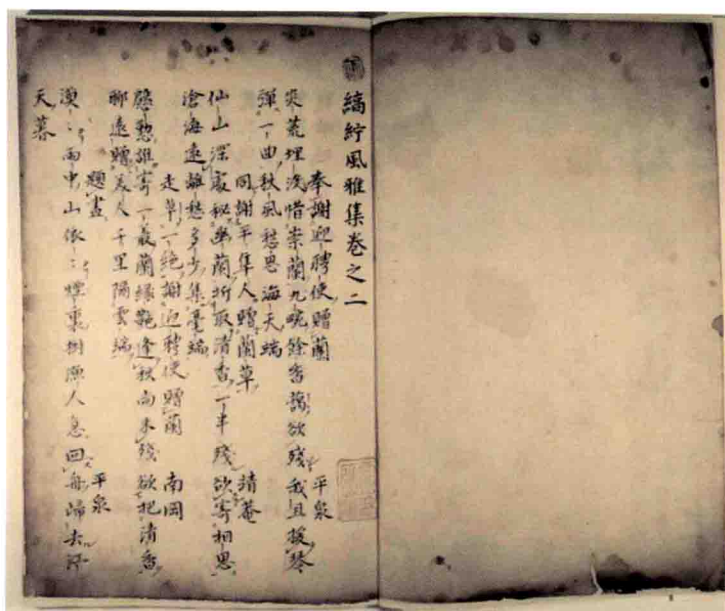
明历度（1655年）通信使笔谈唱和资料《朝鲜信使东槎纪行》（日本雨森芳洲文库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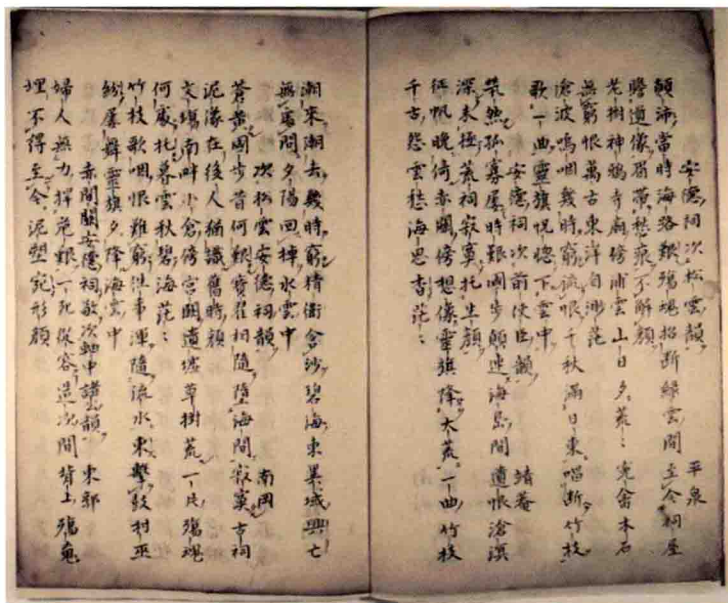
明历度（1655年）通信使笔谈唱和资料《朝鲜信使东槎纪行》（日本雨森芳洲文库藏）



明历度（1655年）通信使笔谈唱和资料《朝鲜信使东槎纪行》（日本雨森芳洲文库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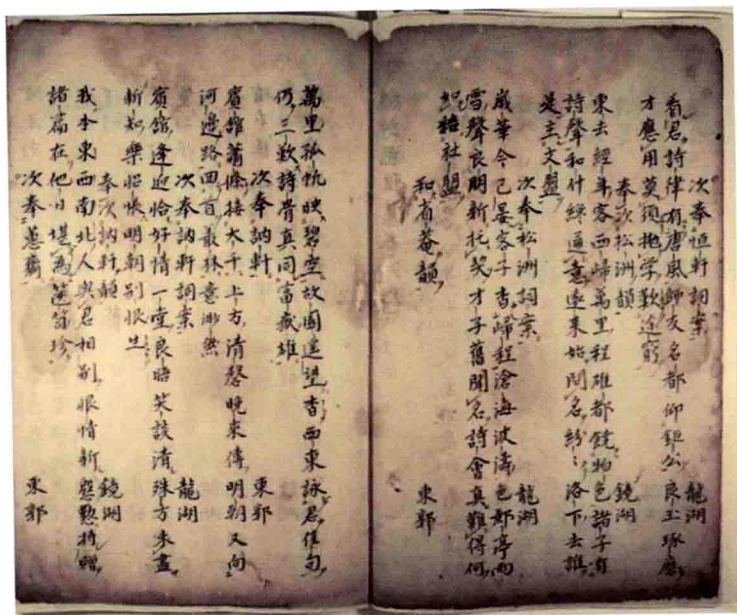
正徳度（1711年）通信使笔谈唱和资料《緋紅風雅集》（日本雨森芳洲文库藏）



正徳度（1711年）通信使笔谈唱和资料《緋紅風雅集》（日本雨森芳洲文库藏）



正德度（1711年）通信使笔谈唱和资料《縹緲風雅集》（日本雨森芳洲文库藏）



正德度（1711年）通信使笔谈唱和资料《縹緲風雅集》（日本雨森芳洲文库藏）

导言 朝鲜赴日通信使文献的意义

◎ 葛兆光

引言 朝鲜赴日通信使与东亚的文化比赛

上篇 暗潮与潜流：朝鲜赴日通信使时代的东亚国际秩序

- 一、朝鲜派遣赴日本通信使的历史与时代背景
- 二、朝鲜通信使团赴日本的主要使命
- 三、朝鲜通信使汉文文献的基本情况

中篇 政治上的自尊：名分与礼仪

- 一、日本与朝鲜国书往来中的“正名”与“书法”
- 二、交聘的礼仪之争
- 三、名分与礼仪中的自尊意识

下篇 文化间的比赛：服饰、风俗、儒学与艺文

- 一、作为文明象征的“衣冠”
- 二、有关民风民俗的观察与偏见
- 三、儒学知识、诗歌文章、绘画书法上的文化竞争

结语 不在场的“在场者”：通信使文献中的中国

“朝鲜既不能以武力胜我，遂欲以文事凌驾于我。”

——日·中井竹山(なかいさくざん)《草茅危言》(1764)

引言 朝鲜赴日通信使与东亚的文化比赛

李朝朝鲜英祖二十三年(1747)是日本延享四年，也是清朝乾隆十二年。两年前，日本源家重(德川家重)继承其父源吉宗的关白之位，唯一与日本有对等外交关系的朝鲜，在这一年依照旧例，派通信使团赴日本表示祝贺。二月中的一天，乘着海上风平浪静，这个庞大的使团乘坐三艘大船^①，从朝鲜釜山出发，经由对马岛去日本。据记载，正船有一百一十六人，副船有一百六十人，从船则有一百四十六人，这是一个四百多人的庞大使团^②。

几百年里，从朝鲜到日本的官方使团走的都是这条路线。由釜山永嘉台下开船，经过对马岛、一歧岛，再到赤间关(下关)，然后经瀬户内海前往大阪，到大阪后弃船登岸，经陆路到达京都以至于江户^③。对马岛是使团必经的第一站，在朝鲜使臣看来，对马岛本来地瘠人穷，可是由于“东通大阪，南接长崎，北通我国，百货辐辏，故民多富饶”。对于他们总是能沾日韩贸易的光，朝鲜使臣们多少有些不高兴，“每以差倭或馆守倭，出往我国，我国之所赠给甚丰，其所以致富

① 按照金庆门《通文馆志》(首尔大学校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2007年)卷六“交邻下”的记载，朝鲜通信使团的渡海船，一般应当是上船三只，卜船三只(第357页)。

② 据学者统计，德川时代从庆长十二年(1607)到文化八年(1811)一共十二次朝鲜通信使团中，有十次使团人数在四百人到五百人之间，最后一次即1811年的那一次最少，为三百三十八人。

③ 朝鲜通信使团从朝鲜到日本的详细路线，见《通文馆志》卷六的记载，大体是自釜山开船，经对马岛，停留若干天，然后经一歧岛，至赤间关(一名下关)，仍船行至兵庫，约需要一个月左右，然后到大阪，由淀浦改为陆路至京都。下面沿着今天的东海道，到达江户(东京)——以上水路三千二百九十里，陆路一千三百十里，共四千六百里。如有日光山焚香之行，则出江户北门三百七十里(第339—340页)。

者,皆由我国”^①。不过,不高兴只是藏在心底里,毕竟日本强于朝鲜,自从丰臣秀吉入侵以来,朝鲜对日本始终有戒心,也有畏惧,所以,无论怎么不满,也只是在心里腹诽几句就算了。在日本人面前,朝鲜使团中的士大夫知识人要表现的,主要是文化的高明和国家的自尊。

为了向日本显示文化的高明和国家的自尊,朝鲜使团有一套惯用的形式,往往船刚到对岸,使团中人就“皆着唐冠道袍,裨将战笠军服,如渡海仪”。在那个时代,衣冠之制常常就是文明象征。朝鲜到大清帝国贺岁或者祝寿的朝贡使团,就常常以自己仍然穿着“大明衣冠”而傲视“已然蛮夷”的清国,而朝鲜赴日本的通信使团,也总是以庄严的传统服饰,显示正宗文明之所在^②。据使团随从人员洪景海的记载,当朝鲜使团以华丽而庄重的衣冠出现在日本人面前时,仿佛文明之间高下立判。为什么?因为日本人“出入之际,跣足解剑”。他特别嘲讽地提到,当地一个通事名叫俊三郎,“其头发尽剃,至于耳上一撮净梳作髻于脑后,以蜡油涂之,以纸绳括之,屈曲而上,长三寸余……”。他觉得,这些日本人真是“形容衣服,极其诡异,不问可知其为蛮夷也”。这刚一亮相,朝鲜就胜了日本一局,于是,朝鲜使臣把自己想象成了文明的化身,而把日本人看成了缺乏知识的蛮夷^③。

千万不要把这种心理看成是“阿 Q”式的自我安慰,在东亚诸国,自从蒙元时代即十三四世纪以后,各国“自国中心思潮”崛起,这确实是一种涉及国家尊严的文化比赛。在通信使行在日本和朝鲜之间往还的这几百年间,朝鲜使团始终在与日本进行着明里暗里的文化比赛,这种文化间的比赛,被详细地记录在朝鲜通信使文献中^④。数十

① 洪景海《随槎日录》(乾隆十二年、日本延享四年),见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首尔:东国大学校,1990年)第59卷,第290页。

② 参看葛兆光《大明衣冠今何在》,《史学月刊》2005年第10期。收入葛兆光《想象异域》(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41—164页。

③ 同上《随槎日录》,见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59卷,第272—273页。

④ 从15世纪20年代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有记录可查的朝鲜赴日通信使团大约有六十余次,留下的通信使汉文文献至少也有四十种上下,而至今留存日本的笔谈、唱和加上绘画作品,也相当丰富。

次朝鲜通信使团,除了身负政治和外交的官方使命外,似乎每一次都在与日本瞪着眼睛彼此观看,又在彼此观看中暗中进行这种比赛,并通过这种“文化间的比赛”,赢得自我的尊严,也赢得对手的尊重,同时也在进行文化间的彼此交流。

因此,从15世纪到19世纪这些朝鲜通信使留下的汉文文献,在东亚文化史上,就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上篇 暗潮与潜流：朝鲜赴日通信使时代的东亚国际秩序

或许,在讨论通信使汉文文献之前,我应当对那个时代的东亚,主要是明清中国、李朝朝鲜、德川时代前后的日本等构成的“国际背景”,以及在这个国际背景中,朝鲜与日本使节的往来情况,作一个最基本的描述。

一、朝鲜派遣赴日本通信使的历史与时代背景

与蒙元横扫欧亚的大帝国时代不同,14世纪中叶之后,东亚进入了一个国际秩序变革与调整的历史时刻。在那个时代,日本进入室町时代(1338),中国发生元、明交替(1368),朝鲜李氏建国(1392),安南黎氏取代陈氏(1400)。其中,新兴的大明王朝致力于重建汉族中国中心的册封体制,重新整顿周边异国往来的礼仪等差^①,李朝朝鲜则需走出蒙古统治时代,重新调整对中国和日本的,不同于过去

^① 明洪武八年,接受礼部尚书牛谅建议,把对明帝国周边的祭祀,放在各个边缘区域负责,不再作为中央王朝的祭祀,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大明帝国不再像蒙元时期那样,把天下都看成是“咱每的”,而是对周边诸国之策略有所变化,明代似乎又像宋代一样,把这些异域看作“外国”,“其外国山川,亦非天子所当亲祀”。因此,由广西附祭安南、占城、真腊、暹罗、锁里,广东附祭三佛齐、爪哇,福建附祭日本、琉球、渤泥,辽东附祭高丽,陕西附祭甘肃、邈甘、乌斯藏,“京城不复祭”。见《明史》(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以下凡引二十四史,均为中华书局校点本)卷四十九《礼三》“吉礼三之岳镇海渚山川”,第1285页。

的交往姿态,因而屡次派出使臣试探明朝的态度^①。14世纪后半叶,稍稍稳定下来的日本,也在寻找新的国际关系模式,以改变由于抵抗“蒙古袭来”而导致的孤立状态,特别是试探大明王朝的反应,因此,执掌政权的足利氏开始积极寻找与李朝朝鲜以及大明帝国的沟通契机^②。虽然大明帝国为了减少麻烦,把隔山限海的日本列为“不征之国”,表明既听之任之,也不闻不问的态度^③,但是足利义满却觉得,日本不应当被摒于东亚国际秩序之外。根据田中健夫《中世对外关系史》的研究^④,由于日本在1374年、1380年两度被明太祖拒绝遣使入贡,使得足利义满意识到,明朝自我尊大的天朝意识,可能是拒绝明日邦交的原因。为了满足大明王朝的虚荣,他辞去将军及太政大臣,以便灵活地以“日本国王”名义与中国交涉。1401年,他以“日本准三后道义上书大明皇帝陛下”的谦卑方式致书大明,试图进入大明朝贡体制以换取通畅的国际邦交和贸易^⑤。

① 李朝刚刚建立的第一年即洪武二十五年(1392)八月,就派人到明王朝去陈情,表明李朝夺取高丽之政权,乃是不得已,希望明朝接受。九月,明太祖表示接受朝鲜的政权变更,并同意其用“朝鲜”为国名,并与之联姻。但是,他也意识到朝鲜仍有离心倾向,所以时时借故威胁和提醒朝鲜国王,“事事都要至诚,直直正正,日头那里起,那里落,天下只是一个日头,慢不得日头”。见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一册,上编卷一,第111—113、140页。

② 如果加上越南,情况就更明显,元代,安南虽然受到册封,但是“王每受天子诏令,但拱立不拜,与使者相见或燕席,位加于使者之上”。他们不仅曾有自己的年号(绍隆),陈日烜甚至在至元二十二年(1285)自称“大越国主”,还有了“宪天体道大明光孝皇帝”的称号。见《元史》卷二〇九《安南传》,第4644、4637页。一直到洪武三年(1370)才受明朝册封,勉强成为朝贡圈中的一分子。但是,他们仍然自称“大越皇帝”,为了这个称呼,也与明朝纠缠不已。

③ 尽管洪武年间,曾经因为胡惟庸案,导致大明与日本之间的嫌隙,但是这种感情上的敌视,仍然要让位于现实上的妥协。洪武年间,日本曾派人来中国学习,永乐年间,足利义持也曾经遣使来沟通,同时,大明帝国也非常理性地把与蒙元形成敌对关系的日本,特别列为不征之国,《明史》卷三百二十二《外国三·日本》记载“列不征之国十五,日本与焉。自是,朝贡不至,而海上之警亦渐息”(第8344页)。

④ 田中健夫《中世对外关系史》(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5年),特别是第一章。

⑤ 此事见瑞溪周风《善邻国宝记》卷中,田中健夫编《善邻国宝记》(东京:集英社,1995年),第108页。大体上是这样的,1401年(应永八年),足利义满遣使到大明,递交了国书,不仅称呼“大明皇帝陛下”,并且称“日本国开辟以来,无不通聘问于上邦”,献上了“金千两、马十匹”等礼物,表示了尊敬与妥协。因而在1402年(应永九年)八月三日,义满在京都北山殿接见使者,接受明建文皇帝所颁正朔大统历,此后1404年(应永十一年),又受“日本国王之印”。

而与朝鲜方面,则以书写日本年号,用“朝鲜国王殿下”和“日本国王源某”的方式交换国书,以表示对等之礼^①。在这个东亚历史转折时代,正如日本学者仲尾宏所说,东亚内外情势之变化出现了新特点,因为在足利义满时代,日本既以“日本国王”的名义进入了明代的朝贡体系,又与明代属国朝鲜以同等立场建立邦交。这样,就改变了9世纪以来东亚只有通商关系的状况,日本与中国、朝鲜建立了国家之间的交往关系,东亚形成了一个新的国际秩序^②。

但是到了15世纪初,情况却稍稍有些变化。李朝太宗八年(1408)也就是明朝的永乐六年、日本应永十五年,朝鲜太祖李成桂去世,同年,日本的足利义满去世,足利义持继任。足利义持改变了其父之策略,对朝鲜不用“国王”名义而自称“征夷大将军”,国书上也只写“日本国源义持”,表示日本大将军与朝鲜国王为对等关系,指责朝鲜致日本的国书居然使用大明的“永乐”年号。因为他认为,这是朝鲜以自贬为大明属国的方式,拖累日本也一起降格成为明朝属国。于是,他一反足利义满时代圆滑和妥协的外交方式,对朝鲜采取了居高临下的态度^③。但事与愿违,1419年反而出现

① 据《朝鲜王朝实录》(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复刊本,1963年)第一册《太宗实录》卷八太宗四年(1404)七月己巳条记载:“日本遣使来聘,且献土物。日本国王源道义也。”(第301页)。朝鲜与日本之间国书,互相用“日本国王”与“朝鲜国王”的名义。在足利义满在世期间,曾七度遣使朝鲜,而朝鲜则在太宗四年(应永十一年,1404,报聘正使吕义孙)、六年(应永十三年,1406,报聘正使尹铭,曾经遇到海难,修复后再出发)两度遣使到日本。

② 仲尾宏《前近代の日本と朝鮮——朝鲜通信使の轨迹》(东京:明石书店,1989年),第24页。不过,他也指出,这种秩序并不牢靠,因为当时日本的国家外交事务,由于公家方面处于无能为力的放弃状态,事实上成为武家专断执行的局面,这体现了日本的二元政治体制。实际上,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都是由武家政治在实际控制。可是在稍后,由于控制全国的足利政权也渐渐弱化,以及各个地方有力量的大名掌握政权,所以,不仅出现地方诸侯的专权化,还出现了濑户内海等地海盗横行,加上掌握了私下流通渠道的商人,于是,在掌握公开外交权力的室町将军之外,形成了这个时代对外的多元交流,正如田中健夫所说的,在对朝鲜交流上,室町将军、大名、中小领主、商人都在起作用。

③ 不过,朝鲜当时仍然派遣使团赴日本,在1413年,朝鲜使者朴资原拟出使,但因病滞留釜山,这时倭寇之患不断,明朝打算用兵平定倭患,加上沿海日本人抢夺使团的礼品和书契等等,朝鲜领议政成石璘建议不要派出使团,被朝鲜太宗采纳,所以这段时间日朝之间的关系处于冷淡状态。

了朝鲜向日本的对马岛入侵,即所谓“应永外寇”事件^①,引起了日本朝野巨大震撼。日本有人甚至觉得,这一事件就如同当年“蒙古再袭”,真是巨大的危机。为了防止朝鲜与大明联手,致使日本两面受敌,因此,不能不重新调整日本的外交姿态^②。这一年十二月,为了解决战争问题,日本派遣博多妙乐寺僧人无涯亮倪去朝鲜,恰好也在这一年,强硬的朝鲜太宗去世,本来就不赞成所谓根本解决倭寇问题的朝鲜世宗执政,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才算得到缓解。正是在这一逐渐和缓的国际背景下,第二年(1420年),朝鲜方面以宋希璟作为“回礼使”出使日本,并向日本赠送大藏经,开启了此后长达数百年朝日外交交流史的新一页。而宋希璟所著的《老松堂日本行录》,也就成为现存通信使汉文文献中的第一部^③。

国际关系虽然看上去往往是对外的事情,但如何处理对外关系,却常常是以国内情势为背景,以自身力量为依托,以求平衡与再平衡的。当导致平衡的内外因素相对稳定,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便可以维持。15世纪20年代以后,尽管有“倭患”引起的种种风波,但这种东亚各国之间的平衡关系,差不多维持了一个多世纪^④。其中,日

① 此时,朝鲜太宗试图根本性解决倭寇问题,对日本的对马岛进行袭击,战争中,双方死伤三千八百人,迫使对马藩年幼的藩主贞盛求和,朝鲜强行把对马归并到庆尚道,还迁徙对马居民到巨济岛。

② 日本对于中国深有戒心,也许是仍然停留在蒙古袭来的历史记忆中。李朝朝鲜的《世宗实录》卷十(世宗二年十月癸卯,1420)记载了这次使团的通事尹仁甫《复命书》,其中记载:“臣等初到其国,待之甚薄,不许入国都。馆于深修庵。……继有僧惠珙来问曰:闻大明将伐日本,信否?答曰:不知也。珙曰:朝鲜与大明同心也,何故不知。先是,大明使宦者敕曰:若不臣服,与朝鲜讨之。继而使者畏害而逃,故疑而问之。”

③ 《老松堂日本行录》有《新订老松堂日本行录》(续群書類从完成会,1933年,1966年),还有村井章介校注本《老松堂日本行录——朝鲜使节の見た中世日本》(东京:岩波书店,岩波文库本,1984年);而在中国影响很大的申叔舟(1417—1475)《海东诸国记》,也正是继宋氏之后出使日本的申叔舟在世宗二十五年(嘉吉三年,1443)作为使臣出使日本后的成果。

④ 如朝鲜世宗十一年(1429,日本正长十一年,足利义敦)朝鲜国王派遣朴端生(正使)、李芸(副使)、金克柔(书状)为首的使团,祝贺足利义敦袭将军职;十年后(朝鲜世宗二十一年,1439,日本水享十一年),又派遣高得宗(正使)、尹仁甫(副使)、金礼荣(书状)为首的使臣组团到京都,请求日本制止倭寇侵扰,恢复旧好;四年后(1443),又派遣以下孝文、申叔舟在内的使团,祝贺足利义胜袭职。一直到朝鲜宣祖二十九年(1590,日本天正十八年),即丰臣秀吉时代,还派遣了黄允吉、金诚一、许篈三使赴日本,祝贺丰臣秀吉统一日本。

本国内形势是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在“应仁之乱”(1467—1477)后,日本陷入长达一个世纪的内乱,根本无暇顾及海西,只是由山口的大内氏以“日本国王”名义,掌控了白银开采与海外贸易,所以,东亚海域内国与国之间关系大体上相对平静而彼此冷淡,搅起局部风波的,只是倭寇的沿海骚扰与掠夺^①。一直要到丰臣秀吉(1537—1598)打败北条氏,统一日本,下征韩令(1591),并发动侵略朝鲜的“壬辰之役”(1592),东亚国际关系才再一次出现巨大的震荡。

不过,即使有丰臣秀吉的入侵,使得日朝、日明关系遭到前所未有的挫折,但应当看到,东北亚的明、朝、日之间,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力量失衡,现实利益和妥协理性仍然可以重新占据上风。所以,在1598年(朝鲜宣祖三十一年、明万历二十六年、日本庆长三年)丰臣秀吉死后,日朝关系很快又出现了转机。1599年,日本(一说是马岛)派出使者柳川调信(1539—1605)到朝鲜,并且在第二年(1600)二月和四月,两次送回被俘虏的朝鲜人以表示诚意。1603年,德川家康继任“征夷大将军”,在对马岛藩主的恳请下,次年(1604)下半年,朝鲜的松云大师惟政(1544—1610)与孙文彧,经由对马赴京都,在第二年的三月二十一日于伏见城与德川家康见面,确认建立“通和”关系。在1606年,对马藩家老柳川调信之子柳川景直(后改名智永)甚至伪造以德川家康名义、措辞谦卑的致朝鲜国书,再度表示通好之意(即“柳川一件”或“伪造国书”事件),还应朝鲜方面的要求,遣送了据说是在壬辰之役中盗掘王陵的“犯陵贼”^②。

① 在此期间,朝鲜也停止了通信使团赴日,除了1475年(朝鲜成宗六年,日本文明七年)、1479年(朝鲜成宗十年,日本文明十一年)有两次之外,即使是这两次,也因故半途而废。所以在日本战国时期,朝日之间通信使团的外交也几乎停顿。

② 伪造国书事件,指的是日本负责与朝鲜交往事宜的对马藩,为了修复由于“壬辰之役”而崩坏的日朝关系,也为了满足朝鲜王朝的面子,1606年,由柳川调信的儿子景直伪造了以日本德川家康名义,用“日本国王”伪印,并且使用明朝年号,给朝鲜国王措辞谦卑的国书,这不仅满足了朝鲜方面由日本先递国书的要求,而且还伪造了两个所谓“犯陵贼”送给朝鲜,作为破坏朝鲜王陵的罪犯。当然,他们为了完成日朝通好,后来也挖改了朝鲜方面的国书,使日本的德川幕府也得到面子。这一对马藩居中作祟的事件,由于1631年柳川调兴(1602—1684)向德川幕府的告发而暴露,史称“柳川一件”。

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求得日朝之间重新通好。所以,后来日本学者都指责对马藩与柳川氏对朝鲜的妥协和谦卑。其实在这个时代,日本国内也面临着各种问题,这使得日本对朝鲜的策略不能不变得缓和。不过,为了防止对马藩居中作祟,稍后,德川幕府直接派遣京都禅宗僧人尤其是建仁寺、天龙寺、相国寺、东福寺的禅僧,到对马岛负责日朝外交事务,这些僧人以深厚的汉文修养,不仅撰写外交文书,而且与朝鲜文人进行笔谈和唱酬,使日朝之间至少是文化关系有了好转。而朝鲜方面呢?壬辰之乱以后的情势也在发生变化,特别是进入17世纪后,一方面对北方女真的崛起感到恐惧,另一方面也不能不警惕来自南方的倭患,为了避免出现“北虏南倭”的窘境,朝鲜也很理性地与日本缓和关系。由于相信“家康先为国书”,也算有了面子,因此,在朝鲜宣祖三十九年,即日本的庆长十二年(1607),朝鲜国王正式回应德川家康,派出“回答兼刷还使”(正使吕佑吉、副使庆暹、从事官丁好宽)正式访问日本,从此开始了日本学界称为“友好与善邻”的德川时代通信使外交旅程^①。

大多数通信使汉文文献,都出现在这个时代。

二、朝鲜通信使团赴日本的主要使命

一般来说,朝鲜通信使团的使命,主要是两国官方的一般外交礼节性的交往、保持彼此商贸的畅通、互相交换情报。大体上,通信使团的使命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类。

(一) “修好”与“睦邻”。

朝鲜与日本隔海相望,历史上一直往来不绝,有文化交流和商

^① 李元植指出:“在日本,足利、丰臣、德川三个武家政权交替,随着时代变化有相应的不同体制,这与各自政权在国家体制上的地位有重要关系。一般来说,足利政权对外寻求大明帝国的册封,以‘日本国王’的名义行使外交权,并形成相应的习惯和礼仪;丰臣政权则自称‘关白’,虽然也自认‘日本国王’,但是他们不受中国册封;德川政权处于丰臣秀吉对外征伐,与中国断绝邦交之后,进行恢复邦交不成功,只是在十七世纪初通过对马岛主的媒介,与朝鲜恢复了国家间的交往。可以说,德川政权就在没有中国册封的前提下,形成了与朝鲜独自外交的体制。”李元植《朝鲜通信使の研究》(京都:思文阁,1997年)第38页。